大众日报 DAZHONG

齐鲁文化

热线电话：(0531)85193379　Email：yaq@dzwww.com

一个村妇的“成神”之路

□　马景阳　李　丽

小清河。”孝妇河穿博山城而过，经淄川、张店、周村入桓台马踏湖，后经广饶、博兴等地汇入小清河，蜿蜒117公里。

孝妇河其实不仅仅是一条普通的河流。

据《齐乘》记载，很久以前，博山八陡村的颜文姜为了给重病的“夫婿”冲喜嫁到郭家，但结婚当天丈夫死亡。“寅时娶进颜家女，卯时死了郭家郎”。婆母硬说颜文姜是“扫帚星”，克死了丈夫，从此颜文姜便天天忍受着婆母的虐待，担两只尖底水筒去十里外挑水，但颜文姜依旧孝敬公婆，照料小姑。太白金星感动化身老人施以援手，送她一条马鞭子，让她把鞭子系在水瓮里，只要提一提鞭子，水就会涨上来。婆婆另生一计，让她回娘家一天，做七双袜子八双鞋。当文姜做完活从娘家返回时，发现村子里大街小巷洪水滚流，原来婆母从水瓮里提出了马鞭子。颜文姜左手拉起公公，右手拽着婆婆，用脚挑起小姑子，自己坐在水缸上，阻止了大灾。水停后，颜文姜坐化成神，在她坐着的地方流出一股甘泉，后人称为灵泉，也叫孝泉，流淌的泉水便成了孝妇河。

洗尽人间不孝心

我国是个特别讲究孝道的国家，“孝”，是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梁漱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中国社会是奠基于孝道上的社会，“孝”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古希腊罗马文明和印度文明的重大文化现象之一。颜文姜因为迎合了不同阶层的意愿成为所有人膜拜的真神。

明代山东御史熊荣写有《孝妇河》诗一首：“孝妇河名自古今，泉头一派更弘深，何当汲去为霖雨，洗尽人间不孝心。”

颜文姜因孝名传天下，民间开始为她立庙建祠。历代统治者也对颜文姜感天动地的孝行给予高度褒扬，官方开始为颜文姜树碑立传。颜文姜祠与其他祠庙不同，它既不弘扬佛法，也不宣传全真，既不是歌颂帝王将相，也不是赞美文人墨客，而是为了纪念一位孝顺的普通村妇，这在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万千古建筑中极其罕见，可谓凤毛麟角，它体现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对孝文化的推崇和爱戴，也成为孝文化代代相传的重要媒介。

一直到现在，每逢颜文姜重要纪念日，博山及其周边地区的老百姓都会自发举办规模宏大的活动，成千上万的百姓前来虔诚地进香供奉，祈祷许愿。据说“颜神娘娘”非常灵验，农历七月初三是颜文姜生日，方圆数百里的善男信女都会赶来祝贺，久而久之形成了长达四天的庙会，从八陡镇到神头村，沿途十几公里的道路两边摆放香案供品，颜文姜祠内更是人头攒动，香火鼎盛。

颜文姜的孝行对博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经济、生活影响很大，形成了淳朴厚重、尊老爱幼的乡风习俗。

但是，前些年，静谧清澈的孝妇河受到严重污染，乌黑的河水泛着恶臭。淄博市把孝妇河治理当做头等大事，要恢复母亲河原有的清冽甘甜。从2004年开始，淄博市投资14亿元进行综合治理，至今，孝妇河恢复了往日风貌。而孝妇河源头的博山区则高度重视孝文化的挖掘、开发和利用，把孝文化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不断做大做强。自2007年以来，博山区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孝文化节，牵头成立了中国(博山)华夏孝文化研究会和山东孝文化研究会，扩建了颜文姜祠，建设了以弘扬孝文化为主题的文姜公园，打造孝文化品牌。

孝妇河畔名人多

孝妇河沿岸能人辈出，仅明清之际就有三位杰出的文人王渔洋、赵执信和蒲松龄，都与颜文姜祠有不解之缘，被称为孝妇河畔三名人。另外，范仲淹和做过“三部”尚书的孙廷铨也是大名鼎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则是现代人的典型。这里只对人们不太熟悉的赵执信和孙廷铨简要介绍。

颜文姜祠大殿外的柱子上刻着一副楹联：“配江河揭日月至诚如神，惊天地感社稷莫大于孝”，就是清初诗人赵执信的手笔。

赵执信，生活康雍时期，18岁中会试第六名，23岁担任山西乡试正考官，35岁升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充《明史》纂修官兼预修《大清会典》，在当时名动京师，当时的名士朱彝尊、陈维崧等非常欣赏赵执信的才华，“尤相引重，订为忘年交”。本应顺风顺水飞黄腾达的赵执信因少年成名恃才傲物，性格孤傲，康熙二十八年秋，赵执信帮友人洪升完成《长生殿》剧本，在观看排演时被人弹劾，时值佟皇后国丧，赵执信因“大不敬”丢官去职，史称《长生殿》案件。当时有诗为赵执信惋惜感叹：“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削职还乡的赵执信四处游历，深感百姓生活之艰辛，写有1000多首诗，大都是现实主义作品。

与颜文姜祠有密切关系的，还有帝师孙廷铨。颜文姜祠的前院正中为正殿，俗称无梁殿，是现存最古老的无梁殿之一，该殿即为孙廷铨领衔重建。

在博山，提起孙廷铨，知道的人不多，但提起孙国老，则无人不晓。其实，两人实为一人。孙廷铨明崇祯十二年考中举人；翌年成进士。后任过清顺治王朝的户部、兵部、吏部尚书，这就是被民间津津乐道的“三部尚书”。“帝师”称号乃康熙所赐。据称孙廷铨为康熙除鳌拜出谋划策，深得康熙恩宠，康熙亲政后，亲书“为帝者师”、“帝赉良弼”两匾额赠孙廷铨。孙廷铨学识渊博，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著作，其中以《颜山杂记》的学术价值最高。该书内容包括山谷、山泉、城市、乡校、风土、长城、物产、农民起义、遗文等，特别是物产部分，是极为珍贵的古代科技史料。

《颜山杂记》的物产部分有石炭、琉璃、铁器等篇。特别是《琉璃志》，仅2000余字，就把琉璃及其产品的成分、炼制过程、产品种类、制作工艺，及至阐明自己对琉璃的来源生成，摒弃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琉璃乃自然之物”而采纳宋代程大昌“铸石为器，古已有之”、“虽西域琉璃，亦用石铸，无自然生成者”的观点，写得有章有序，清清楚楚。《琉璃志》是一部系统而全面地记述琉璃工艺技术的科技文献，这对后来博山琉璃业的发展以及专家学者对博山琉璃的探讨与研究，都具有翔实可靠的史料价值。　**(摄影/马景阳)**

静静的孝妇河

夏日的孝妇河，波光粼粼。被博山人视为母亲河的孝妇河古称“笼水”、“陇水”。据《水经注·陇水》记载：“此水源出博山神头颜文姜祠下，由南而北流，汇诸泉贯淄川之中，经西墙下，流经桓台入

■ 尺书闲话

高俅怎样发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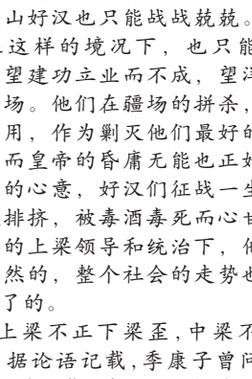
□　张　伟

俗话说，问题出在下面，根子在上面。《水浒传》刚一开篇，便交待了“洪太尉误走妖魔”的全过程，仿佛是这句俗语的解读：京师闹瘟疫，钦差洪太尉洪信去请张天师祈禳，到了天师住处，胆小怕事、无能而又趾高气扬的洪太尉不仅没有请到天师，还在游山的时候受好奇心驱使放走了前代祖师锁住的妖魔——一百零八个魔军，住持解释说，“若放他出世，必恼下方生灵”。洪信害怕天子知道后责骂他，就隐瞒了实情而装作没事人一般，照旧做他的官，拿他的俸禄。就这儿提到的一百零八个妖魔而言，很显然指的就是后来的梁山一百零八位好汉。如果说这一百零八位好汉是霍乱时世的妖魔的话，那么放走这些妖魔的才是罪魁祸首。如果不是洪太尉无能不听劝谏而擅自行动，这些作乱者是不可能自己逃出来惹事的。这足以说明，乱自上作，没有上面的人胡作非为，下面的人即使有作乱之心也不可能为之。

宋徽宗淫乱昏庸，不理朝政，因此高俅等佞恶之人才得以专权，高俅的发迹史就足以说明一切。高俅、童贯等奸佞之臣横行霸道，作恶多端，那些贪官污吏就适应上梁的领导而应运而生，如年年耕种的庄稼，周而复始代代不息，才有了官僚的腐败和搜刮民脂民膏的小吏们的猖獗，才有了世事的混乱，生灵的惨遭涂炭，以致于有田虎和王庆的反抗，方腊的作乱，才让当时的宋王朝各项指标直线下降，最后一败涂地，导致亡国的悲剧结局。这是一个连锁反应，是一环扣一环的。如果宋徽宗能够像唐太宗李世民一样清正廉明，一样治国利民，就不会有高俅等人的独揽大权，就能够让那些想为国为民出力谋幸福的人们真正的做事，譬如宿太尉，他不敢轻易地讲话，不敢轻易地反驳高俅等上司，而只能剑走偏锋，只能独辟奇径，帮助梁山好汉也只能战战兢兢。梁山好汉们在这样的境况下，也只能忍气吞声，指望建功立业而不成，望洋兴叹，战死疆场。他们在疆场的拼杀，恰恰被坏人利用，作为剿灭他们最好的时机和手段，而皇帝的昏庸无能也正好迎合了奸臣们的心意，好汉们征战一生的结果却是被排挤，被毒酒毒死而心甘情愿，在这样的上梁领导和统治下，他们的结局是必然的，整个社会的走势也是他们左右不了的。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据论语记载，季康子曾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中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上”指国君，他的意思是说凡是法律制度推行不了的，都是由于国君违犯了它。商鞅变法，起初反对的人很多，包括太子也犯了法，商鞅不便将太子治罪，于是严惩了太子的老师，这样一来秦国人就都遵守法令了。

我们在看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电影时总会发现这样的镜头：遇到难攻克的山头时，共产党这边的指挥官总是喊：“同志们，跟我来。”而敌军那边的领导就喊：“兄弟们，给我冲。”这就是区别，导致最后的执行效果截然相反。



■ 群贤毕至

谁才是《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无数专家经过研究，找到了一群符合特征的作者。其中，可能性最大的就是山东章丘人李开先。

“嘉靖才子”李开先

□　王佳声　侯茜雪

很多人都知道《金瓶梅》的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但谁才是真正的“兰陵笑笑生”至今尚无定论。无数专家经过研究，找到了一群符合“兰陵笑笑生”特征的作者，这其中最有可能的作者之一就是明代杰出文学家、戏曲作家和书籍收藏家的山东章丘人李开先。

从济南沿着309国道东行，过圣井立交桥后，在国道南侧就能看到一座李开先纪念馆。其中，李开先墓是济南市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439年过去，此处早已物去人非，冢墓萧然。

李开先(1502-1568年)，字伯华，号中麓。他“生而卓异，七岁能文，读书一见辄成诵，为文下笔辄千言”。且为人正直刚烈，不畏权贵。明正德十六年，他年仅十九岁，因徭役繁重，进县衙与县令说理，为民请命，减径徭役，深受当地百姓敬佩。

嘉靖七年，26岁的李开先参加山东乡试，中举人第二名，次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授户部云南司主事。在三年“试用期”里，政绩卓著，赢得了“雅负经济”的赞誉。嘉靖十三年春，李开先被提升任吏部考功司主事。十九年，又升任太常寺少卿。这段时期，他在仕途上春风得意，一路扶摇直上。但在39岁时他却突遭罢官，成为了党羽斗争的牺牲品，结束了十二载的宦海生涯。

在李开先为官期间，内阁首辅夏言招权纳贿，排斥异己，招致李开先的座师礼部尚书霍韬的不满。虽然李开先没有像霍韬那样激烈地与夏言争斗，但是因为与霍韬的关系，他已经是夏言的眼中钉了。嘉靖十九年，霍韬去世，次年夏言便利用宗庙失火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李开先从朝野中清除了。

布衣还乡后，李开先便寄情山水文艺，游历名山胜水，建亭园，组戏班；办书院，结词社，与文人墨客诗文唱合，著述甚丰。

李开先偏爱通俗文学，他的许多剧本来源于生活，著名的《打哑禅院本》就来自于他的一位好友无印禅师出的笑话。无印禅师是当地的一位知名高僧，在一次禅宗“打哑禅”活动中，却自认输给了一个屠夫。经过李开先的润色加工，这个故事广为流传开来。在他的妙笔下，一个是满腹经纶的长老，一个是大字不识的屠夫，一对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却煞有介事地“斗法”。由相声名家常连安整理表演的单口相声《山东斗法》，就是根据这个院本改编的。

在戏曲创作上，李开先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和演员，李家戏班子的演员则从全国“海选“产生。李开先的后人说，李开先曾亲自在《断发记》中饰演男一号李德武，声情并茂的表演打动了很多听众，一位姓王的大户人家的小姐由此迷恋上了这位“明星”，成为他的铁杆“粉丝”。经过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相恋后，刚刚断弦的李开先迎娶了这位在他生命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王小姐，成就了一段曲坛佳话。

除了沉醉于创作、演戏，李开先还在章丘城周围建起了五座藏书楼，每座藏书楼都按照前厅后楼的式样建造，前厅用于会客和排演戏剧，后楼用于居住和藏书。所藏以词曲话本最多，有“词山曲海”之誉。清末大文学家朱彝尊赞其“藏书之富，甲于齐东”。

他对于时事政治的关注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尤以嘉靖二十六年完成的《宝剑记》最为著名。

《宝剑记》被誉为明中叶传奇的开山之作，共五十二回，改编自《水浒传》的第七回和第十二回。全剧通过林冲逼上梁山、兵发汴京、迫帝除奸的故事，反映的虽是北宋末年朝政的腐败，影射的却是明嘉靖王朝的黑暗。

李开先把林冲的故事复杂化，对林冲的形象也作了较大改动，由委曲求全、处处忍让，变为主动反抗、嫉恶如仇。《水浒传》中林冲与高俅的矛盾，是由高俅的儿子高衙内要霸占林冲的妻子引起的，而李开先在《宝剑记》中则改为由林冲多次上疏弹劾高俅独霸朝廷、祸国殃民而引起的。这就把林冲和高俅之间的私恨斗争，提升到了为民除奸的高度。故事的结局也完全不同。小说中林冲是含恨病死了，而在传奇中他最终杀死了高俅父子，并且与妻子团聚。

可以说，在小说中林冲这一形象侧重表达的是官逼民反的社会黑暗面，而林冲形象在传奇中的改变则是为了突出忠奸善恶的激烈斗争以及恶不胜善的思想。借传奇言志，正如雪蓑渔者在《宝剑记》序中说：“足以寒奸雄之胆而坚良善之心。”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王平教授评价说，李开先是“嘉靖八才子”之一，他的“词山曲海”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特别是他创作的《宝剑记》，作为明中叶三大传奇之首，是明代戏曲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对明清通俗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中国戏曲及文学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图上齐鲁·镇馆之宝

东方维纳斯

□　付卫杰

1996年10月，青州博物馆在龙兴寺遗址北部，发掘了一处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出土北魏至北宋时期的佛教造像四百余尊，因造像数量多、雕刻精美、贴金彩绘鲜艳完好，一出土就引起学术、宗教与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随之入选“中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被誉为可以改写中国艺术史的杰作。

青州龙兴寺窖藏出土的造像，其形制主要为高浮雕背屏式造像和单体圆雕造像，而单体造像的艺术特色主要集中在佛、菩萨造像上。尤其是单体菩萨像，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件东魏贴金彩绘菩萨像，即为其中典型的一件。该造像通高200厘米，石灰石质。菩萨头戴宝冠，黑发顺肩部下垂。面相丰满圆润，柳眉高鼻，杏眼长目，小嘴上翘，呈微笑状，神态庄重宁静。颈佩轮状项圈，上身袒露，精美的璎珞垂于前身，在下腹部结于圆璧。下身着百褶长裙。菩萨跣足立于莲台上。遗憾的是该菩萨的两臂已失，但其清秀的面容、迷人的微笑、高雅的气质、富丽堂皇的装饰仍征服了众多前来参观的游客。有人将其称为东方的维纳斯，它可比维纳斯要大得多了！

正是青州龙兴寺窖藏的发现，才使得我们有幸看到古青州地区佛教艺术的风貌，也就有了最早被山东大学刘凤君教授提出的“青州风格”的诞生。但龙兴寺遗址地面上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了，只在青州地方志中可窥一斑。

该遗址位于今青州城西驼山路以西，南阳河以南一带。在参观青州市博物馆时，可以看到龙兴寺窖藏遗址原貌。据清光绪《益都县图志》载：龙兴寺，在(青州)府城西北隅。寺中有宋碑，金人刻其阴曰：宋元嘉二年(425年)但呼佛堂。……北齐武平四年(573年)赐额南阳寺。隋开皇元年(581年)改曰长乐，又曰道藏。则天天寿二年(690年)改名大云。开元十八年(730年)始号龙兴。宋代以来，代为名刹。明洪武初，拓地建齐藩，而寺址遂淹。

至此龙兴寺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直至1996年益都师范学校操场动工，偶然发现佛教造像窖藏，又将其纳入了人们的视线。窖藏东西长8.7米，南北宽6.8米，底部距地表3.45米，偏东部有一南北斜坡道直达窖底。造像在窖藏内分三层排列，三层摆入均为东西向，厚0.7米左右。较完整的造像放置于窖藏中部，残碎的造像上部用较大的造像残件覆盖有少量坐姿造像呈立式排放，各种头像存放于坑壁边缘。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件精美的菩萨像在出土时，并非完整，而是断为三块，并且分布于窖藏的三个位置。在发掘时先发现的是其腹部以下半身，后在西北壁角见到头部，最后才拼上胸部的一块三角形残块。

■ 海岱一方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　王学文

有清一代的诗坛领袖王渔洋，出生于我省桓台县有名的“新城王氏”，其家族从明朝中叶到清朝中叶，300多年间科甲蝉联，叔侄进士，兄弟督抚，父子尚书，光耀迭出。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代祖先竟是从诸城到桓台给地主扛长工的“打工崽”，第一代的女主人也是贫家女子。这一对贫贱夫妻存道义之心，行道义之事，并且对儿孙言传身教，在家境不甚宽裕的情况下，在第二代培养出了一位“尤好施予”的“善人公”。以这种良善家风作温床，当王家从第三代开始有能力供养子孙读书时，渐次成长为一个横跨明清的名门望族。

不难看出，“新城王氏”能够取得显赫功业，一个重要原因是“忠厚传家”。

说起“忠厚传家”，让人联想起那副流传于国内许多地方、更在山东大地常见的春联：“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这副春联与齐鲁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深深影响了山东人。

《论语》“学而”篇有言：“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这里，“孝、悌、谨而信、泛爱、亲仁”可用“忠厚”概括，“学文”可用“诗书”表意，这副春联大体表达了这句“论语”的意蕴。而且，“忠厚”是品德培养，品德让人立得住身，“读书”是能力培养，能力让人走得开路，无论是《论语》还是这副春联，都将品德培养置于能力培养前头，这反映了一个人入世做一番事业的成长规律，具有科学性。

看其上联，忠厚就是忠义厚道，就是忠人之事、以诚交往、宽厚仗义，这是从古至今山东人自觉遵循的行为规范。一个《列女传》上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一点。齐国攻打鲁国，鲁国一位村妇在逃亡途中，丢下自己的孩子，只带着侄子逃命。面对疑惑不解的齐国将军，这位鲁国妇人说，丢掉自己的孩子虽然心痛，但合于道义。齐国将领感叹鲁国是仁义之国，不忍攻打，回去禀报国君，竟也获得同意。现在，茌平县建有纪念这位鲁国村妇的义姑祠，这位妇人以及她的做人做事道理，感化着一代代齐鲁儿女，影响着齐鲁儿女的行为。

在山东，“忠义”不仅是个人修养，更上升为许多家族的文化，以此泽被乡里，惠及天下，而这些家族也人丁兴旺，传家久远。

这并不是简单的“善有善报”的因果报应，而是有其内在道理。一个人秉持忠厚本性，在一些小事上会吃亏，但会在其周围形成一个良好的人际磁场，做事顺遂宽广，款款成事。这就是《菜根谭》上所说的“仁人心地宽舒，便福厚而庆长，事事成个宽舒气象”。而忠厚品德上升为一种家族文化，代代相传，则会代代获得佑助。这就是《易经》上所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这方面的事例在齐鲁大地不胜枚举。

有孔夫子黄钟大吕般教化，有几千年来的家传乡约，有春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广为传播，“忠厚”已在齐鲁大地深深扎根，成为今日山东人的性格基因，深深融入齐鲁文化的骨髓血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山东人更加坚守忠厚品德，而这样做的现实结果，往往是让人更乐于与之交往，引来更大的回报。这方面的事例在山东也是不胜枚举。而在万千山东人的践行下，忠义品德塑造了山东人的良好形象，成为山东发展的软实力，成为山东人建设美好家园的重要力量。

□　责任编辑　于岸青